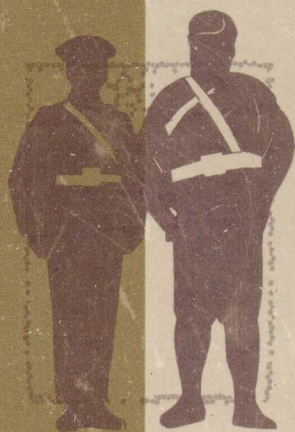


蒋介石冯玉祥交往实录

蒋冯书简新编

陶英惠 辑注



013025168

K827
1606

蒋介石冯玉祥交往实录
蒋冯书简新编

陶英惠
辑注



上海三联书店



北航

C1631989

K827

1606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蒋介石冯玉祥交往实录: 蒋冯书简新编 / 陶英惠辑注. — 上海:
上海三联书店, 2012.12

ISBN 978-7-5426-4058-1

I. ①蒋… II. ①陶… III. ①蒋介石(1887—1975) — 书信集
②冯玉祥(1882—1948) — 书信集 IV. ① K827=7 ② K825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76564 号

本书由陶英惠授权, 限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。

蒋介石冯玉祥交往实录

编 者 / 陶英惠

责任编辑 / 叶 庆 李 珏

特约编辑 / 陈 黎 谢仲伟 文 文

装帧设计 / 徐 婕

监 制 / 任中伟

出版发行 / 上海三联书店

(201199)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

<http://www.sjpc.1932.com>

邮购电话 / 021-24175971

印 刷 /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
版 次 / 2013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710×1000 1/16

字 数 / 450 千字

印 张 / 30.5

ISBN 978-7-5426-4058-1/K · 207

定 价: 49.8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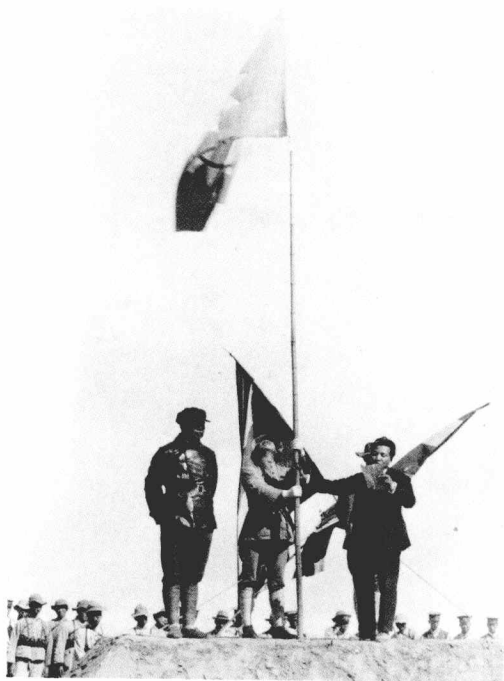


1926 年，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。



冯玉祥 (1882 ~ 1948), 字焕章, 安徽巢县人。民国后历任河南督军、陆军检阅使、直系军阀第三军总司令、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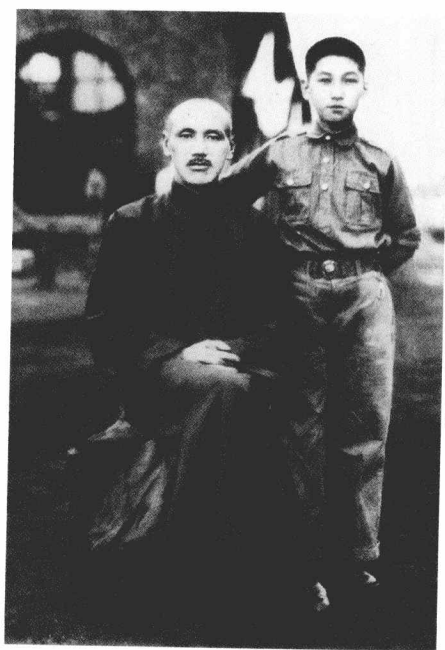
1926年9月，冯玉祥（左一）在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，在绥远（今内蒙古）五原誓师，将部队改编为国民联军，正式参加国民革命。右一为总政治部副部长刘伯坚。



1928年，国民革命军三大将领（左至右）冯玉祥、蒋介石、阎锡山的合影。



1927年6月，冯玉祥（前排左一）与蒋介石（前排左三）在江苏徐州开会，决定合作反共、反苏，并促成南京政府和武汉政府合作。



1930年，中原大战期间，蒋介石与蒋纬国在河南的商丘车站。蒋介石不久前受到冯玉祥的大刀骑兵队袭击。



1939 年，重庆，冯玉祥与彭德怀。



解放战争时期，赴美国考察的冯玉祥在美国街头演讲，反对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。

冯玉祥遗嘱末页。

遺稿寫完還要加上一句假
如我死不了民主的真聯合政
府成立我決不担任政府任何
職務我只願意任在外國寫
我的生活免得別人以為
我是去作什麼官打總裁
的
馮玉祥

倭寇深入赤匪猖獗
吾人攘外必須安內
我中國之大患乃在人
心後難救凌危精神
萎靡不振而又不能
忍苦耐勞乃致寇
深匪狂當我政權
宣傳之同志未刻苦
耐勞堅定工作不
身負責打破目前
之難關完成革命
未之使命有厚
重焉此致
宣傳諸同志
蔣中正 三月十日

1932年3月，蒋介石书写的关于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训示。

自序

我对蒋介石、冯玉祥两人，并未作过深入的研究，十多年前，忽奉《传记文学》杂志社刘绍唐（宗向）社长之邀，着手辑注蒋介石、冯玉祥两人公私来往函电，可以说是非常偶然的。

绍唐社长素来热心于近代史料之搜集、刊布；由于他曾在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过，所以对于蒋介石的资料更是特予留意。有关蒋介石的生平言行，经其亲自核定刊行最早的有两种，一为1931年冬刊行的《自反录》，一为1937年春出版的《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》。就史料价值言，前者远较后者为珍贵。如《自反录》第二集，收录了1926年夏至1931年冬大量的重要文件，在这五年中，正值北伐、编遣会议不欢而散、西征武汉桂系、讨伐唐生智、冯玉祥称兵反抗中央、阎锡山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等大联合、中原大战、扩大会议、以及广东成立国民政府等重大事件，接连不断的发生，蒋介石如何应付、处理这些事件的原始函电，都完整的收录在这一集中，其史料价值之高，自不待言。可是上述两部书，自初次印行后，坊间曾再次排印过《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》，至于《自反录》则没有人注意，既未再版行世，也乏人征引用作研究资料，何以致此？令人有些费解！

1992年初，绍唐社长告诉我，他托美国的友人代为复印了一套《自反录》，想要影印出版，广为流传，以弥补其不被重视的遗憾，并嘉惠史学界的学人；但是复印件的书边处，偶有因为厚度的关系未印清楚，甚至漏印一行，托我代为检查补订一下。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，我曾数度到孙逸仙博士图书馆为之查对，也曾就近代史研究所庋藏的微卷加以核对。该书内容有关文电、函札、计划、建议、演讲等，细读之下，发现其中颇多性情之作。

蒋介石在手书自序中说是“以为朝夕自反之资”，并未公开发行，所以流传不广。

1998年1月中旬，绍唐社长又寄来一册影印的《蒋冯书简》，嘱代为增补整理。我因为看过《自反录》，觉得与《蒋冯书简》两相对照，可以理出一条清晰的脉络，很有意义，因与绍唐社长商定：将两人来往函电，依照时间先后顺序排列，将已搜存者先在《传记文学》发表，并继续公开征求两人来往的函电，尽量求全。因为仅靠《自反录》与《蒋冯书简》，定有太多的遗漏。我于是再就《冯玉祥日记》、《冯玉祥选集》以及当时有关的报章杂志等，扩大搜寻范围，并到国史馆抄录大溪档案中之相关函电。这时适逢小儿俊安及儿媳林淑慧，趁耶诞假期自美返台省亲，也陪著我去国史馆，我选好后，交他俩抄录，颇有所获。经过多方增补后，虽然仍不够完整，但已经有了相当可观的成绩。1998年12月，绍唐社长便在《传记文学》第七十三卷第六期开始连载，并吁请读者、专家就所藏所见者随时予以增补；俟搜集有相当数量后，再编为专书，当作民国史上一项重要史料。不料这时绍唐社长的健康出了问题，《蒋冯书简新编》只刊出了四期，他即于2000年2月10日，以肝肿瘤病逝三军总医院。俗语说“人亡政息”，在所难免，连载的事，因之中断。而《自反录》之出版，更是胎死腹中。

不久，《传记文学》改由世新大学成嘉玲、成露茜女士接办。2000年11月29日，我到东吴大学参加其百年校庆所举办的学术研讨会，《传记文学》杂志社编辑部邱庆麟先生到会场拉稿，我告以《蒋冯书简新编》尚有存稿在社中未曾发表。邱先生转告成社长后，自七十八卷第三期起恢复陆续刊载，直到2005年4月第八十六卷第四期，全部刊载完毕，前后共刊出三十六期。

成社长在恢复续刊的编者按语中，点出了该书的重要性，特照录如下，除可供读者参考外，并藉向成社长表达感谢之忱。其按语云：

“在中国近现代史军阀混战中，蒋介石与冯玉祥可谓独步鹰扬于当时，两人手握重兵，各据一方，互为犄角。同时两人为了本身的利益，始而订交，进而结盟。在长达二十多年的交往当中，两人别具怀抱，时而兵戎相见，时而握手言和，可以说是恩怨不断。

蒋冯二人之分合，影响民国政局至巨，其中有关两人公私来往函电，颇具史料价值，但如果不加以详细的注解，实在难以说明他们二人之间交往的真相。辑注者陶英惠教授，任职于‘中央研究院’近代史研究所，为这批函电作注目的在理出一条清晰可辨的脉络，帮助读者在阅读时，对蒋冯二人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；并对治中国现代史者，提供一份难得的资料。”

在全文刊载完毕后，又有幸获得蔡登山先生的重视，并无私的代为安排出版事宜，使刘绍唐社长最初辑录蒋介石、冯玉祥两人公私来往函电的愿望，得以完全实现，更是一项偶然。特向蔡先生敬致由衷的谢意！美中不足的是刘绍唐社长最早就想影印出版《自反录》的心愿，恐怕再也无由实现。就对也曾参预其事的我来说，内心不免有些若有所失！

陶英惠 谨识

2009年2月16日于南港“中研院”近史所

导 言

蒋中正（介石）和冯玉祥（焕章），曾是左右民国政局、极一时风云际会的人物，分别代表中央军（黄埔）、国民军（西北）两军系的领袖。1949年后随国民党来台之西北军故旧，除少数几人留在政治舞台外，多数都过着退隐式的生活。有关西北军的史料，面临被扭曲或湮灭的危险。“中央研究院”近代史研究所于1955年成立之初，郭廷以所长别具慧眼，在进行“口述历史”计划时，首先搜集以冯玉祥为中心的西北军史实，对来台之西北军将领，如石敬亭（筱山）、熊斌（哲明）、秦德纯（绍文）、刘景健、孙连仲（仿鲁）等进行访谈，希望在他们的口述中，挖掘出过去未见诸文字的秘闻，抢救一些最珍贵的直接史料。可惜，由于当时政治禁忌太多，被访谈者，语多保留，未能畅所欲言。

无独有偶，刘绍唐先生在1962年6月创办了《传记文学》杂志后，也有计划的在发掘与西北军有关的史料，对西北军名将的回忆录、传记等不断的刊布，在专书方面，已出版：《秦德纯回忆录》、《刘汝明回忆录》、《张上将自忠画传》、《宋哲元与七七抗战》、《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》、《冯玉祥传》、《西北从军记》等；又发表了很多篇有关将领的传记，如：赵登禹（舜诚）、佟麟阁（捷三）、鹿钟麟（瑞伯）、韩复榘（向方）、石友三（汉章）、张之江（紫岷）等，保存下许多珍贵纪录。

民国初年，军阀及政客结拜的风气甚盛，要皆基于本身一时之利害而订交，故反目成仇者，屡见不鲜，蒋介石、冯玉祥二人也未能例外。蒋介石拉拢冯玉祥为其消除异己，完成统一大业；冯玉祥则借重蒋介石的势力来巩固、并扩大自己的地盘；可以说是各有所图。他们自1928年2月18日在郑州换帖，到1948年8月31日（或作9月1日）冯玉祥在黑海敖德萨（Odessa）

港附近俄轮“胜利（Pobeda）号”上，以放映电影起火而被焚死，二人“异姓兄弟”的关系，维持了二十年又六个多月。在这二十多年中，他们二人，时而兵戎相见，时而握手言和，反覆较量，可以说恩怨一直不断，最后终于分道扬镳，彻底决裂，盟兄成了反蒋的急先锋。

绍唐社长深感蒋介石、冯玉祥二人之分分合合，影响民国政局至大，有意辑录两人公私来往函电，酌加注释，除将已搜存者先在《传记文学》发表，并吁请读者、专家就所藏所见者予以增补；俟搜集有相当篇幅后，再编为专书，当为民国史上一项重要史料。笔者认为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事，奉邀参与此项工作。兹先就蒋介石、冯玉祥二人交往的大概情形，作一简要说明，供作参考。

蒋冯的崛起

孙中山先生为建立革命武力，于1924年6月成立黄埔军官学校，以蒋介石任校长。同年10月，军校学生平定广州商团事变，开始崭露头角。1925年2月，蒋介石率军校教导团及粤军第一次东征，连战皆捷；6月，讨平杨希闵、刘震寰之叛，巩固了革命根据地。国民党在广州既能控制局势，乃于7月1日取消大本营，成立国民政府，下设有军事委员会，以蒋介石及汪兆铭（精卫）、谭延闿（祖安）、胡汉民（展堂）等八人为委员。为统一军政，各军改称国民革命军。8月，党军改为第一军，以蒋介石为军长。自此奠下其在国民革命军中的地位。

冯玉祥出身行伍，以治兵甚严而闻名；惟性多疑善变。1924年9月，第二次直奉战事爆发，冯玉祥以直系部将，率所部自古北口班师回京，与老同盟会员胡景翼（笠僧）、孙岳（禹行）两军会合，号国民一、二、三军，趁机倒戈，反吴佩孚（子玉），发动“首都革命”。从此，国民军则成为新兴崛起之独立军系。1925年1月，冯玉祥专任西北边防督办，将国民一军各部统辖于西北边防督办署，改称为暂编西北陆军，取消国民军名称，以后即称“西北军”。

“首都革命”后，冯玉祥依照与胡、孙之约定，电请中山先生北上解决国是，并联合奉系拥段祺瑞再起为临时执政。未几，以争地盘故，又展开新的权力斗争：先是直系与国民二、三军联合讨奉，冯玉祥之国民一军则暗联郭松龄叛张作霖，激怒奉系，因演成直奉弃嫌修好，联合讨冯。冯玉祥一举树立直奉两大强敌，又因处置直隶地盘问题，内部也发生了意见，遂于1926年1月1日通电下野，只身经外蒙赴俄乞援，并与南方之国民政府互通款曲。^[1]1月25日，蒋介石与汪精卫曾联名电劝冯玉祥，谓“时事多艰，请消退隐。”

南北呼应 互蒙其利

1926年初，由于奉直在华北夹击国民军，定要将其打倒；蒋介石认为国民军被打倒后，下一个目标必然是国民革命军，乃于2月24日提议早定北伐大计、应援西北国民军案。3月31日及4月2日，冯玉祥之代表、前同盟会员马伯援到广州，分谒代理国府主席谭延闿及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，谓国民军必与国民党合作、解决国事。翌日，蒋介石即上书国民党中央，请整军肃党，准备北伐。他认为：国民军退出京津、尚未被完全消灭前，英、日两国必协定以奉军对西北之国民军，以吴佩孚对南方之广东革命军，故应联络国民军，使其退守西北，保留固有之势力；并于三个月内出兵北伐，在吴之势力尚未充足之际，一举而占领武汉。4月10日，国民政府委员会致函冯玉祥，谓决积极筹备北伐，期会师中原，共定国难。4月15日，国民军由北京退往南口。4月30日，蒋介石又与中央执监委会商北伐计划，主联合冯、阎（锡山）以牵制奉军。6月3日，蒋介石电邀冯玉祥来粤共筹大计。6月11日，冯玉祥复电谓：“我救国军队非会师武汉，不能达救国之目的。”

[1] 中国社科院近史所中华民国研究室编《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·大事记》，第十二辑（北京，中华书局，一九八二年四月出版），页18。原电文尚未觅得。

即派李鸣钟（晓东）、刘骥（菊村）全权赴粤会商。^[1]此前，冯玉祥已与国民党人多有往来，但与蒋介石之互通函电，可能自此始。6月5日，国民政府特任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，于7月9日就职，即誓师北伐。从此逐渐掌握了军政大权。

北方的军阀混战之际，国民党在广东趁机发展。蒋介石誓师北伐时，国民军正与奉直联军酣战，尤以南口之役，至为酷烈，吴佩孚的大部分精锐，被吸引、牵制在北方，削弱了两湖的防御力量，使其首尾不能相顾，北伐军因得势如破竹向北推进。蒋介石心存感激，后在国民军联军南口阵亡将士追悼大会中致词时说：

当革命军自粤出发，未几下桂趋湘。彼时正西北革命同志与反革命者激战南口。赖诸烈士之牺牲，直军不能南下守鄂，北伐军遂长驱北上，冲破长（沙）岳（阳）。后日西北同志，虽退绥（远）甘（肃），而北伐大军，已以破竹之势，消灭反动势力，建立政府于武汉。是北伐成功，多赖南口死难烈士；革命同志，幸勿忘之也。^[2]

从另一角度来看，由于蒋介石如约于7月出师北伐，克湘、鄂，围武昌，迫吴于8月移兵南援，与北伐军相持于武胜关，因此得解国民军之难。冯玉祥也曾表达过感激之意：

回想客岁蒋总司令介石同志，不避劳苦，决心北伐，故能得今日革命伟业，不但救军阀虐待下之民众，亦且救我西北军。^[3]

双方在战略上的密切配合，收到了互蒙其利的效果。

[1] 冯玉祥著、余华心整理《冯玉祥自传》（北京，军事科学出版社，一九八八年十一月第一版），页90。时李鸣钟、刘骥与冯同在俄国，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《冯玉祥日记》，第二册，页193：“同李鸣钟、刘骥二弟谈。”江苏古籍出版社，一九九二年一月第一版。

[2] 李泰棻《国民军史稿》，页491。

[3] 同上，页340。

郑州结盟 合力北伐

1926年9月16日，冯玉祥自俄归抵五原，17日就任国民联军总司令，收拾残局，重整旗鼓，正式加入国民革命行列，平定甘陕，出潼关而锋逼中原，侧击直鲁联军，声势壮大。不仅提高了冯玉祥的地位，也发挥了左右世局的作用。

1927年4月18日，国民政府奠都南京，宁汉分裂，双方都因冯玉祥拥有重兵而与之信使往还，争相拉拢，皆欲藉冯玉祥之助以打倒对方。而冯玉祥依违于宁汉之间，权衡得失，意存观望，态度十分暧昧。武汉方面抢先于6月11日、12两日，与冯玉祥举行郑州会议，以河南地盘相让，使豫、陕、甘三省军政大权，尽入冯手。19日，冯玉祥在黄郛（膺白）的建议下，应蒋介石之邀到徐州，蒋介石在花园饭店设宴欢迎，此为二人初次见面。20、21日，^[1]即与宁方要员在徐州举行会议，达成一致北伐、同取反共态度之协议。

在半个月之内，冯玉祥分与敌对之宁汉双方举行重要会议，顿将自己塑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，获得了最大的利益。他选择了宁方，迫使武汉分共，促成宁汉合作之局。冯玉祥因与奉系积怨已久，只有劝宁汉息争，共同北伐，才能解除奉鲁对他的威胁，保住其在华北的地盘。宁汉洽商合作，继又发生世传的所谓“桂系逼宫”，而蒋介石不得不于8月13日暂行引退。^[2]

[1] 冯玉祥于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对上尉以上官长讲话云：“现宁汉合作已成事实，诚可喜也。前者危机四伏，一触即发，因双方均是革命党，故我军不便左右袒，只好从中排解。……惟是我曾因苦心调和，致讨双方不好，南京则骂我接近共产党，而武汉则骂我反革命，并将我军所应得之物品亦予扣留，真所谓两姑之间难为妇也。”（《冯玉祥日记》，第二册，页368。）至于徐州会议、与蒋介石会面事，冯玉祥在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日日记中也留有简单的纪录：“五点，赴花园饭店。（在徐州）与蒋中正、李宗仁、白崇禧等会议。午后一点半，与李烈钧谈时局：一、联晋制奉，晋阎实力，不能敌奉。现闻奉方三路攻晋，晋必不支，宜援助百川，以牵制奉张。二、消除内部隔阂。目下军事胜利，宁汉两方宜集中势力，乘胜北伐，使敌不得休息。六点半，再赴花园饭店会议，至夜一点始归。”六月二十一日日记：“十点，蒋介石来电话，谓如武汉军东下，请派兵直捣武汉。告以绝无此事。午后半点，晤蒋辞行。”（《冯玉祥日记》，第二册，页337。）

[2] 冯玉祥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七日与李组绅谈蒋介石通电下野事云：“当此北伐吃紧之时，乃党国要人，不以国家民众为前提，精诚团结，一致对外，顾斤斤焉而操同室之戈，徒使卖国军阀张目耳，能不令人失望耶。”（《冯玉祥日记》，第二册，页364。）